



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

← (上接5版)

时尚并不是权力影响的结果,主导其走向的,常常是一些职位并不显赫的官吏。黄易身在济宁,“任城自古金石窟”,具有先天的地域优势。与字画大多集中于都市不同,碑刻地点不集中,需要组织具体的推拓,这些也不是你有地位、你有权就能解决的。同时,拓本价格不高,相对而言收藏门槛比较低,因而许多人都有收藏的机会与条件。这样,在乾嘉时期,就形成了一个搜集与收藏金石拓本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所有参与者需要紧密合作,才有机会完善个人收藏的种类、数量与质量,很像上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集邮。从高官、硕儒到地方官、幕僚、山长,再到一般的布衣、掇客、古董商,通过拓片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金石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虽没有明确的组织构造,但它的成员具有相似的知识背景,在情感方式与趣味体验上也有相当的一致性。除了极少数的欺诈行为,这一时期大多没有晚清藏家相互间的提防与谎言,比如学生想买什么东西要瞒着老师;明明自己购买了,却要四处放风被西洋人买走了。

我觉得这个共同体最重要的特点是公开,信息公开、收藏公开、观点公开。金石学研究涉及文字、名物、历史,其先决条件是对金石刻铭进行释文,在乾嘉金石共同体中,参与者非常广泛,他们常常通过书信、题跋集中讨论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这种纸上聚会使得不同时空的学术观点随时得到传播、发扬、纠正与重组,同时也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精致化。如李东琪不同意翁方纲关于《祀三公山碑》的一些释文,曾作札由黄易转达,尽管他的地位与翁方纲非常悬殊;黄易所得汉魏五碑,翁方纲、孔继涵、孙星衍、张埏、桂馥等人也都各自释文,他们有不少意见针锋相对,翁方纲甚至在题跋中直接指出张埏所释“绿、边”等字皆不准确,要求“观者勿信”;对于武梁祠画像《武氏前室画像十五

石》的第二石“人首鸟身”,毕沅的幕僚朱文藻认为人首鸟身的图像来源于西方,毕沅虽不予认同,他认为出自《山海经》,但由他和阮元主持的《山左金石志》仍然刊出了朱的意见,这些都体现出难得的学术平等与学术的严肃性,乾嘉学术的气象也由此可窥。

文汇报:您在最后也谈到此一时期的公私不分问题,也就是职务与自己的爱好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薛龙春:1800年,巡漕御史何道生在写给黄易的一首诗中说:“我职《河渠书》,我志《金石录》。何期遇双井,熊鱼兼所欲。”虽然二人情形相似,但他羡慕黄易能够兼顾“职”与“志”。黄易的本职是河工,也就是主持勘察、挑工、筑堤、防汛等工作,他的访碑与收藏,他的出版事业,他的书画印的创作,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与精力无从计算,但我们未必可以说他的志业对他的本职工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我认为文献遗存的偏向性多少引导了我们的判断。从一些零星的资料,我们仍可发现黄易运河厅的工作异常繁忙,他甚至到任济宁20年后才第一次来到省城济南,除了乾嘉之交居忧期间的两次远足,他在济宁及周边的访碑极其有限,访拓活动大多由家中仆隶完成。

同样可以讨论的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公与私界限明晰、专业与非专业壁垒森严,自然会带来更高的效率,但同时也失去了像乾嘉金石学这样广泛的“学术中间阶层”,以及各种日常交往所提供的研究素材与机会。我们正在亲眼看到,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学者们这方面的经验——黄易们的“古欢”——正在不断消失。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一般的爱好者已经没有机会在正式的学术会议或是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专家”垄断了一切,但气象却日益浇薄,无复乾嘉旧观。

蔚茹水(葫芦河)探源

之“黑水”与“清水”

鲁西奇

“黑水”之称,颇值得注意。“黑水”之本义,应当是指清澈冷冽的溪流,意在强调其水之清,所以,“黑水”就是“清水”,其水是否很深而使水成黑色,可能倒不是重点。《禹贡》黑水之所指或所在,自古以来,众说纷歧,却少有人追问何以称为“黑水”(并非完全没有)。

清水河(葫芦河)

《太平寰宇记》原州萧关县下与泾州保定县下所记“蔚茹水”之名,均可与“葫芦河(川)”之名互换,说明“蔚茹”与“葫芦”很可能本来就是同一发音的不同汉字书写(如果能请当地人说说这两个词,可能会更好些,虽然也并不是可靠的证据),但也可能是因发音略有不同所致。

原州(固原)的葫芦川(蔚茹水)在唐代颇有著名。《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武州萧关县下说:“贞观六年以突厥降户置缘州,治平高之他楼城。高宗置他楼县,隶原州,神龙元年省,更置萧关县。白草军在蔚茹水之西,至德后没吐蕃。”(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69页)这条蔚茹水,即今之清水河。在至德以前,它就名为“蔚茹水”。在今茹河被称为蔚茹水之后,原来的蔚茹水仍然叫蔚茹水。上引《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原州萧关县“蔚茹水”条所记即是证明。又,《新唐书》卷一七四《牛僧孺传》记僧孺之言,说“赞普牧马蔚茹川,若东袭陇坂,以骑缀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则京师戒严,虽得百维州何益!”(第5231页)这里的蔚茹川,在“陇坂”之西,“回中”(当指秦回中宫,在今宁夏隆德县)之西北,显然是指今清水河之蔚茹川。《宋史》卷二五七《李继隆传》说李继隆建议由古原州蔚茹河路,运送粮草往灵州,路途较为便利。太宗批准了他的计划,命李继隆率师以进,壁原州,这就是宋镇戎军(中华书局点校本,第8998页)。宋镇戎军所在的“蔚茹河”,当然就是今清水河。《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泾原议渭镇戎德顺军路》“德顺军”条引经略使韩琦之言,说“笮竿城为山外四砦之首,北接镇戎军,捍一路,戎

马走集;北缘胡卢川河,经古萧关至鸣沙县。乞建为军。”(《中国兵书集成》本,第915-916页)其“萧关路”条称:“自(镇戎)军北刘璠堡,级葫芦河川,过古城、八苇子湾,出萧关,至鸣沙县界,入灵武,约五百余里,地形平敞。”其“刘璠堡”条:“缘葫芦河川路,北控贼界,从苇子湾至故萧关。”(第915页)

2019年6月24日下午,考察团所考察的平夏古城(位于固原市原州区黄铎堡村)就位于清水河左岸最重要的支流冬至河东岸,东距清水河亦不足十公里。事实上,清水河谷是一条宽广的川道,上引《武经总要》说萧关路“地形平敞”,确然是实际的描述。《宋史》卷八七《地理志》“怀德军”(即平夏城)说平夏城“东至结沟堡一十五里,西至石门堡一十八里。”(第2160页)石门堡即须弥山侧的石门关,结沟堡即在今清水河东岸的甘沟村。石门堡、平夏城与结沟堡三座城堡,自西向东构成一条防线,扼住清水河及其支流冬至河流经的川道。

考察团接着考察了王浩堡(在固原西北杨郎乡),也就是与平夏城齐名的“灵平砦”。灵平砦在平夏城南十二里,二者相距甚近。灵平砦东至古高平堡一十五里,西至九羊寨三十二里(《宋史》卷八七《地理志》,第2160页),也是由三个堡砦构成一道防线。

正因为清水河谷是一条较为宽阔的川道(远比茹水河谷为宽),所以,自秦汉以来,它就是从固原北渡黄河的最重要的通道,一直非常著名。固原以北的战国秦长城,蜿蜒在低缓起伏的山岭间,也说明清水河谷及其两侧,实际上是自古以来的大通道,而并非北南不同人群的天然阻隔。

可是,这条河,在文献记载中,最初的名字,也并不是蔚茹水或葫芦河,而是乌水。汉代有乌氏县,王莽时改称乌亭。《汉书·地理志》安定郡乌氏县原注称:“乌水出(县)西,北入河。都卢山在西。”(中华书局本,第1615页)汉乌氏县,向来被定在崆峒山之东,乌水在其西,北入于河(黄河),当然只能是今清水河。《续汉书·郡国志》安定郡乌枝县下刘昭注补说“本传有龙池山。《地道记》曰乌水出。”(第3519页)刘昭注补所引《地道记》,当即王隐《晋书地道志》,则乌水出龙池山之说,晋时即有。《水经注》卷二《河水》二经文记河水东北流,过安定北界麦田山,注称麦田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据注文,河水东北流,过麦田城后,东北,“迆于黑城北”,又东北,“高平川山注之,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陇山苦水谷,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嚣,吴汉从高平第一城苦水谷入,即是谷也。东北流,

(下转7版) →



北大文研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在固原段秦昭襄王长城遗址留影